

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问题检视与路径前瞻

王战军 张 微 翟亚军

摘要:学科专业是高等教育的核心支柱,其设置调整是国家教育强国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与战略引擎。我国学科专业设置调整面临“快与慢”的周期失衡、“近与远”的视野割裂、“内与外”的生态脱节三重结构性矛盾。追根溯源,行政层面调控的刚性束缚与审批流程固化,导致了对国家战略急需领域的响应缺乏灵活性与时效性;市场层面需求信号的碎片化与协同机制缺失,使得行业企业的真实需求难以精准传导至学科布局实践;院校层面学术封闭的路径依赖与响应能力不足,跨学科组织架构、资源配置及评价激励机制不完善,制约了调整的内生动力与实践效能。为此,需以动态响应机制激活效能,构建“快慢有序、张弛有度”的弹性调整机制;以战略需求牵引校准调整方向,推动学科设置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响应”跃升;以开放协同生态激发动能,构建“内外联动、跨界共生”的学科发展共同体,构建“多元协同、分层衔接、分类施策”的学科设置调整保障机制,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关键词:学科专业设置调整;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国家战略需求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717(2026)02-0004-09

一、问题的提出

学科专业是高等教育的核心支柱,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是国家教育强国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与战略引擎,更是衔接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关键纽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学科专业设置调整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明确要求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牵引,动态调整优化高等教育学科设置。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1]。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将学科设置调整提升至关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战略高度,为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指明了出发点、落脚点、着力点,更是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上,为建设自强卓

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指明了方向。

“学科”兼具知识分类与规训社会双重属性^{[2]33-35,[3]}。伯顿·克拉克提出,学科专业通过知识领域实现专业化,是人类对现有知识范畴的一种组织和管理状态,内在结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2]34}。传统学科以知识生产纯粹性为核心,强调知识体系的完整性;而现代学科则向服务国家战略、支撑产业创新等功能纬度拓展^[4],形成“社会服务、创新驱动、文化引领”的复合功能体系^[5]。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的核心议题,学科调整的内涵早已超越高校教育范畴。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基于经济现代化需求的学科调整^[6],到新时代面向新质生产力的学科优化^[7],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始终服务于实现国家战略发展与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目标。当前,

收稿日期: 2025-07-24

基金项目: 202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交叉学科有组织科研的影响因素及运行机制研究”(24YJC880175)。

作者简介: 王战军,河北邯郸人,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评价、管理信息系统研究;北京,100081。张微(通信作者),山东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济南,250100。翟亚军,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102206。

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涌现,我国学科专业优化调整到了不得不“变”以及必须思考“如何之变”的历史拐点^[8]。学科专业设置是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的核心载体,其适配性直接影响国家战略需求响应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质量。

我国学科专业设置调整的突出问题并非泛化的矛盾集合,而是政府、市场与院校三方互动失衡的具象化呈现。政府的战略导向、市场的需求牵引与院校的学术逻辑未能形成高效协同作用,在节奏适配、目标协同、逻辑联动等层面存在结构性错位,导致学科布局与国家战略需求、产业发展实际、学术发展规律难以精准契合。本研究系统检视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的现实问题,探究问题成因并提出路径前瞻,以期完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助力教育强国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镜鉴。

二、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的问题检视

1978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做好高等学校专业设置和改造工作的意见》,我国各高校积极探索学科专业的交叉和融合,学科综合趋势渐现雏形。1981年国务院批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标志着我国学科专业目录基本框架的初步形成。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布,推动了一批陈旧落后学科和专业的改造,加强了基础学科建设,增设了一批新学科,拓宽了学科的知识面。此后,学科目录先后经过1990年、1997年、2001年、2011年、2022年5次调整,学科门类也由10个增加到14个,一级学科由63个增加到117个,调整周期由最初的十年压缩至两年。近年来相关政策也密集出台,2023年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指出到2025年要优化调整20%的学科专业布点;《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方案(2025—2027年)》中进一步提出“实施急需学科专业超常布局行动,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快速布局一批学科专业点”。尽管学科设置调整的频率与力度持续加大,但实践中仍面临“快

与慢”的节奏失衡、“近与远”的目标割裂、“内与外”的逻辑脱节的核心问题。

(一)“快”与“慢”:科技迭代速度与学科调整周期的失衡

全球科技革命以指数级速度重构产业格局与人才需求结构,我国教育强国战略的持续推进对高素质人才的“快”供给提出迫切要求。但管理层面的“慢”响应与科技迭代的“快”节奏显著失衡,成为制约高等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的关键问题。科技变革以短周期、高频率重塑需求,而学科调整受限于管理端的效率短板,导致了供给侧人才培养与需求侧的科技严重错位,成为制约高等教育有效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核心瓶颈。

从“快”的现实需求来看,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以指数级速度重构产业格局与人才需求结构,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快”供给提出迫切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从AlphaGo突破到ChatGPT商业化仅用4年,智能驾驶从L2级跨越到L4级仅用6年,前沿技术技能半衰期已缩短至2.5年^[9]。技术爆炸直接导致62%的现有学科知识体系面临重构局面^[10]。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育种等新兴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超传统学科知识更新周期,对人才知识结构与能力素养提出全新要求,形成“学科追着科技跑”的被动局面,亟须学科专业设置快速跟进以匹配技术变革与产业需求。同时,国家战略对急需学科的超常布局要求,以及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对应用型人才的即时需求,进一步强化了学科专业设置快速响应的现实诉求。

从“慢”的调整现状看,学科专业管理的“慢”使其难以跟上外部需求的“快”节奏,具体表现集中在管理体系的刚性约束与流程阻滞:一是学科专业目录的刚性框架根植于学科发展的代际规律,学科体系的建立需经历知识积累、范式确立、学术共同体形成等阶段,传统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往往滞后于技术变革与战略需求,难以快速纳入量子计算、神经芯片等前沿领域;二是行业特色高校新专业建设受师资结构刚性与知识转化周期的双重限制,新兴技术从实验室研发到教学应用平均需要3~5年才能形成稳定的培养能力^[11],与新兴学科要求的2~3年技术迭代周期不匹配。

（二）“近”与“远”：短期需求响应与中长期战略布局的割裂

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中“近”与“远”的割裂，专业发展的短期功利性与长期积累性、知识生产的即时性需求与学科专业演化的自然周期之间的深层矛盾，集中表现为高校对市场短期诉求的盲目迎合与中长期战略布局的缺失，最终导致调整方向与国家战略长期需求脱节。高校对市场短期需求的盲目迎合，是高校在学科选择上的价值偏差与行为短视，与前文提到的“管理层面效率不足导致学科调整滞后”是两个维度的问题，滞后是管理流程、机制导致的调整时效滞后，二者共同加剧了学科布局的结构性失衡。

从“近”的目标导向来看，市场短期化诉求主导学科调整方向，导致学科建设流于表面化、同质化。部分高校管理政策以专业增设数量、短期就业数据等量化指标为核心的考核导向，叠加市场短期利益的驱动，使得高校陷入“赶热点、铺摊子、求规模”的被动跟风状态。为快速抢占市场红利、提升招生吸引力，高校往往优先布局低成本、易招生的热门专业，对专业建设的可行性、师资配套、学科契合度缺乏审慎论证，形成一哄而上的同质化专业布局。例如，某高校为完成“双一流”考核指标，三年内新增12个目录外专业，却未建立配套师资培养机制。一些高校在缺乏师资保障的情况下，为快速提升学科覆盖率，通过更名式、拼盘式调整学科专业响应市场需求，学科建设仅停留在形式层面。这一现象在上海、北京等地政策文件中均有印证。《上海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发展规划（2015—2030年）》明确指出，上海高校办学还存在盲目追求“高、大、全”，学科专业低水平重复设置等问题；

《关于推进北京高等学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工作的若干意见》也指出，北京高校的学科专业低水平重复建设、效益不高，在设置上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等。这种以市场短期诉求为核心的学科调整倾向，直接导致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同质化问题日益严重，大量低成本、易招生的“泡沫专业”持续涌现，最终造成教育资源的低效配置与浪费^[12]。

从“远”的战略布局来看，高校因盲目迎合市场短期需求，严重挤压了中长期战略布局的空间，导致学科发展与国家长期战略需求脱节，缺乏对前沿

领域的前瞻性部署。曾经，彩票行业因短期快速发展催生阶段性人才需求，而相关专业化人才培养体系尚未形成，某高校便以市场短期需求为导向，仓促设立与彩票相关的专业。但该专业因缺乏深厚的学科基础支撑、与国家长期战略需求关联度低，且未形成稳定的人才供需生态，很快出现生源持续流失、无法正常开课的困境，于次年便停止招生，成为高校忽视长远战略、盲目迎合短期市场需求的典型案例。行业特色高校中，这种短期化倾向进一步表现为“脱离主干学科盲目以学科交叉为名铺摊子”乱象^[13]。有研究对我国东、中、西部14所行业特色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进行调研，发现超过一半的高校将其主干特色学科布局于某单一门类集中建设，原本在传统优势领域的学科竞争力因资源分流受到影响^[14]。此外，我国高校的基础学科发展持续受挤压，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在学科总量中的占比偏低，与《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强化基础学科建设的战略要求不符，难以形成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转化的完整学科链条，最终使学科调整无法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长期人才与技术储备。

（三）“内”与“外”：学科内部闭环与外部社会需求的脱节

学科专业设置调整“内”与“外”的脱节，表现为高校学科内部的封闭运行逻辑与外部社会需求的动态变化逻辑未能有效衔接。学科内部闭环的形成源于知识生产的自然周期与学术范式的传承惯性，而外部社会需求的快速迭代则要求学科调整突破传统边界，二者的错位导致学科发展难以有效回应国家战略与产业变革的现实需求。

从政府与社会的“外”部需求看，国家战略导向与市场需求信号未能精准、高效传导至高校学科调整实践，形成了“需求端有诉求、传导链有梗阻”的困境。一方面，行政主导的学科专业目录设置与审批机制，强化了学术权威的封闭性，政策设计中对知识体系完整性的强调远超出对市场需求适配性的考量。同时，政府主导的传统学科评估体系“重论文数量轻实践创新”，进一步导致院校强化维护既有学术范式的倾向，而非主动对接产业需求，导致国家战略对学科布局的牵引作用难以通过行政机制有效落地。另一方面，市场需求反馈信号的传导

存在断裂,产业端的技术革新与人才需求难以转化为学科建设的具体方向。例如,当前全球半导体产业已进入“后摩尔时代”,先进封装成为提升芯片性能的核心路径之一。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2025—2030年中国先进封装材料行业深度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显示,3D封装技术已实现大规模商用。但多数高校微电子专业的“半导体封装测试”课程仍以传统2D封装的基础理论为主,对3D封装的TSV工艺、Chiplet的信号完整性设计、先进封装的热仿真分析等产业核心技术覆盖不足。尽管国家政策强调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是衔接市场需求与高校学科调整的关键纽带,但由于缺乏针对性的统筹机制与激励政策,产业界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意愿普遍偏低。2023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中超过90%来自中央财政,企业在前沿技术研发与教学转化中的参与度极低,最终形成校热企冷的失衡格局。

从学科内部生态看,高校学科体系仍存在显著的自我封闭与路径依赖现象,高校难以主动对接外部需求变化。这与“近”与“远”中“盲目迎合市场”的短视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盲目迎合”是高校对外部短期信号的过度反应,“自我封闭”则是高校对外部真实长期需求的反应迟钝。一方面,学科壁垒固化加剧交叉融合困境。作为时代精神的结构体现,学科结构变迁具有极强路径依赖的特点^[15]。正如玛格丽特·阿切爾所言,“一旦一种既定形态的教育得以存在,它就会对未来教育的变革产生影响。”^[16]这种路径依赖深刻嵌入学科体系的制度设计与资源配置逻辑。我国高校传统院系行政边界分明,师资编制、教育经费等资源配置均以单一学科为单位,对跨学科知识生产造成制度性阻隔。学科交叉并非简单的知识拼接,而是一个兼具长期性与复杂性的动态演化过程。截至2024年6月30日,我国共有240所高校自主设置了883个交叉学科,涉及学科专业目录中的94个一级学科^[17]。在一级学科主导的评价与资源分配体系下,交叉学科难以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与制度保障,知识生产仍被局限于传统学科框架内。无论是国家层面的政策引导还是高校内部的布局规划,都倾向于沿用原有学科建设路径以规避风险,跨学科创新的效能被严重削弱。另一方面,学科建设长期以知识体系的传承性与学术深度为核心,存在重学术逻辑轻社会需求的固有倾向。我国学科专业目录

历经多次调整,虽强化了体系完整性,但也固化了学科边界,导致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比例失调,使得学科体系难以灵活响应外部产业升级、技术革新带来的需求变化,加剧了供需适配的结构性矛盾。

三、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的问题成因分析

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是教育资源配置的关键环节,其运行过程中暴露出的深层矛盾,本质上是多元主体诉求、不同价值导向与机制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调整机制的行政主导与刚性约束是“快”与“慢”失衡的根源,战略规划短视化与评估体系的功利化催生了“近”与“远”割裂的价值偏差;协同育人的机制性障碍与需求传导的不畅性,进一步加剧了“内”与“外”脱节的结构矛盾。这些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以机制逻辑、价值逻辑与结构逻辑的多重交织,共同制约着学科专业设置的科学化水平与高等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

(一) 行政层面: 调控的刚性束缚与审批流程的固化

政府作为学科专业调整的战略引领者和规则制定者,其调控机制的不完善是导致学科专业调整问题的核心诱因。一方面,学科目录管理的刚性束缚与更新滞后,限制了学科自主发展空间。与西方国家更多依靠市场或大学学术力量引导学科变化相比,我国的国家意志体现更为显著,是强烈的上位主导逻辑^[18]⁷²。从历史渊源看,我国学科体系的发展始终与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深度绑定,形成了难以突破的制度惯性。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适应工业化建设需求,我国学科体系脱胎于苏联模式,确立了高度集中的专业分工体系与行政指令式的管理逻辑,学科设置、调整与资源配置均由政府统一规划,形成“政策牵引、学科响应”的单向联动机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高等教育尽管逐步推行“中央统一领导、中央与地方两级管理”模式改革,却仍未改变政府对学科专业目录、审批权限的绝对控制,行政指令依旧是学科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行政主体的管控权力过大,其他多元主体参与不足,导致学科专业调整难以形成需求牵引、动态调整的良性循环^[19]。这种历史形成的

制度惯性,使得政府在学科调整中天然倾向于通过行政手段推进工作,忽视知识生产的自然周期与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为学科调整与市场迭代的节奏失衡埋下了制度根源。

另一方面,制度供给的碎片化问题显著,缺乏统筹学科设置、资源配置、评价考核的一体化机制。学位授权审核流程的固化拉长进一步强化了调控的刚性,加剧了学科调整的滞后性。现行学科管理制度规定,专业设置需经“校内论证、省级审核、国家备案”三级审批^[20],流程周期长达18~24个月。这种过于烦琐的行政流程,是政府为保障学科设置规范性而采取的审慎措施,但在实践中却因流程固化、层级过多,难以适配市场技术迭代的快速节奏。这种制度滞后性在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尤为突出。据《北京市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发展报告(2024)》测算,2025年北京市人工智能技术人才缺口约37万人;2030年集成电路领域人才缺口约40万人^[21],但高校因审批周期限制,难以在短时间内调整专业设置,直接导致了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窗口期”错配。2024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了《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进一步细化了新增学位点的申报审核和动态调整工作程序。3年一次的学位授权点竞争性申报难以满足急需学科的超常布局需求,而动态调整中“新增个数不得超过撤销个数”的规则限制,抑制了高校调整的灵活性,使得高校在响应突发战略需求时面临制度性障碍。

(二) 市场层面:需求信号的碎片化与协同机制缺失

市场是学科专业调整的重要牵引力量,其需求信号的失真与资源配置的短视性强化了学科专业调整困境。一方面,市场需求信号的碎片化与滞后性,导致高校难以精准捕捉产业前沿的人才需求细节。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平台的功能尚未完全发挥作用,产业需求与学科调整的精准对接缺乏有效的数据支撑,人才需求多通过招聘市场、行业协会等零散渠道传递,数据采集缺乏系统性与时效性,导致学科专业调整与市场需求出现偏差,难以形成“需求—调整—反馈”的闭环。劳动力市场的短期波动易放大虚假需求信号,部分高校仅凭短期就业数据盲目增设热门专业,忽视了产业需求的周期性与自身学科基础,最终导致学科供给与市场真实需求错位,既

造成教育资源浪费,又加剧“就业难”与“用工荒”的结构性矛盾。同时,校企合作普遍存在“校热企冷”的现象,合作形式单一、机制不健全^[22],加之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市场参与学科调整的动力不足。协同机制的失效,最终导致学科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的结构性错位持续扩大,教育资源投入与产业实际需求严重错配。

另一方面,市场对学科价值的功利化评判进一步强化了院校的短期化行为倾向。市场通过“绿牌”“红牌”学科排名、毕业生薪资水平等量化指标,对学科价值形成单向评价,这种评价导向直接影响院校的资源配置与学科调整决策。研究显示,就业市场对学科调整的影响较为明显,综合教育部对相关学科的黄牌警告、警示与撤销目录,学生就业较差、学科专业未能迭代升级、人才培养饱和的学科被调整裁撤最多^{[18][71]}。院校为提升市场认可度与招生吸引力,往往优先布局市场热度高、就业反馈快的专业,而对基础学科、冷门绝学等虽关乎国家战略但短期市场反馈不明显的领域缺乏投入意愿。这种“市场热则院校追”的单向跟随,在全球高等教育领域呈现出相似的失衡特征,成为学科结构趋同、基础学科发展受挤压的共性问题。1970—2019年的数据显示,美国商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数在近50年里的相对增长率高达28.5%,而生物和生物医学、农业与自然资源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数的相对增长率分别仅为2.08%和0.81%^[23]。

(三) 院校层面:学术封闭的路径依赖与响应能力不足

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提出的“箱格化隔离”理论,深刻揭示了现代学科体系的根本性缺陷^[24]。

“箱格化隔离”是指传统学科建制通过化简与割裂的双重机制,将复杂的现实现象拆解为孤立的简单要素,使本应相互关联的知识领域陷入彼此隔绝的状态,最终形成封闭割裂的知识箱格。这种隔离不仅阻断了学科间的深度对话与融合,更本质性地遮蔽了真实世界问题的整体性与复杂性。作为学科专业调整的实施主体,高校治理能力与内生动力的缺失是问题产生的关键症结。一方面,学科长期以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与学术范式的传承性为核心,形成了排斥外部干预的内生惯性。作为资源配置、人事管理和学术评价的基本单元,学科固化的行政边界将知

识、人才等关键要素锁定在内部循环,学科专业若突破多重行政限制,制度成本将显著增加,直接抑制多主体协同响应意愿。学术共同体长期形成的范式依赖与路径锁定,使其对偏离传统体系的新兴交叉方向天然排斥,部分颠覆性科学思想和跨领域的研究因难以契合主流评价标准,难以获得资源支持,进一步削弱了学科对前沿需求的感知灵敏度^[25]。

另一方面,学科调整的资源保障与评价激励机制不完善。师资队伍的单学科依附性特征明显,跨学科互聘、兼职机制不健全,现有评价体系侧重激励传统学科内的精细化研究,导致高校缺乏支撑学科调整的核心人力资源。课程体系更新滞后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部分新增专业仍停留在单一学科知识的简单叠加,未实现跨领域知识的深度融合与重构,无法匹配“模式Ⅲ”知识生产对复合型能力的需求^[26]。此外,基层学术组织自主权受限,二级学科方向调整需遵循烦琐行政流程,难以根据产业技术变革和学术前沿动态快速微调培养方案,而高校内部资源配置的固化进一步限制了学科调整的灵活性。

四、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的路径前瞻

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的科学性与前瞻性直接关系到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深度融合,更关乎我国在全球创新版图中能否抢占战略制高点。针对“布局失衡、协同不足、治理滞后”等问题及行政干预错位、市场信号失真、院校自主缺位的深层成因,需构建政府精准治理、市场高效赋能、院校自主革新的三维联动路径,实现学科专业设置与国家战略、产业需求、学术发展的深度适配,推动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高质量发展。

(一) 构建动态响应机制:破解快慢失衡的周期之困

针对科技迭代“快”与学科调整“慢”的系统张力,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层须打破行政主导的刚性调整模式,建立技术赋能、流程优化、多元协同的动态响应体系,实现调整周期与需求变化的精准适配。

首先,搭建技术赋能的需求感知与预测闭环。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重塑学科设置的底层逻辑,

推动高等教育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

一是构建国家级学科专业大数据平台,打通教育部、人社部、科技部等部门数据壁垒,建立包含学科专业现状、就业市场、产业需求的三维数据库,实现对全球学科动态的实时监测。二是开发智能预测大模型,运用机器学习算法构建学科专业、人才供需预测模型,通过历史数据与实时信号的交叉验证,提升预测的精准性。通过构建学科与产业的知识图谱,实时追踪量子信息、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的技术成熟度曲线,为学科设置提供前瞻性指引。三是建立“人在回路”的智能决策机制,将数据监测、智能预警与靶向调控有机结合,确保调整策略的科学性与动态性。这种技术驱动的动态响应机制,不仅能突破传统调整的周期限制,更能依托数据驱动的精准画像,实现对领域知识整体性与动态性认识^[27],实现学科布局与国家战略需求、科技前沿的动态匹配。

其次,打破行政主导的刚性调整模式,优化市场化需求传导与协同机制。通过重构政府、市场、高校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学科专业调整治理体系,推动行政调控从“全面管控”向“精准治理”转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牵引作用,打通需求表达、反馈闭环的关键堵点。在行政调控优化层面,要突破学科专业目录的固化框架与三级审批的流程壁垒,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打破“新增个数不得超过撤销个数”的动态调整规则限制,赋予高校更大的学科专业自主设置与调整权限,让高校能够根据科技迭代与产业需求灵活微调培养方案。在市场机制完善层面,健全市场需求信号的精准识别与有效传导机制,畅通产业界与教育界的常态化沟通对接渠道。一方面,依托大数据技术建立人才质量追踪反馈系统,企业通过该系统实时反馈毕业生岗位适配情况与能力短板,为高校动态调整培养方案提供精准依据。强化对市场信号的灵敏捕捉,通过企业招聘数据、产业升级动态等,形成“需求生成—学科响应—质量反馈”的闭环机制,避免学科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节。另一方面,建立市场主体参与学科调整的激励机制,对深度参与学科建设且成效显著的企业给予科研项目倾斜等政策支持,激发市场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加强市场信息发布的规范化建设,避免虚假信息误导高校学科设置,确保市场信号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二）深化战略需求牵引：弥合近远割裂的视野鸿沟

首先，建立国家战略需求精准对接机制。推动政府行政角色转型，从学科调整的直接决策者转变为战略引领者、规则制定者与过程监督者，以靶向调控替代全面管控。一是依托并用好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平台，系统挖掘并分析人才供需的结构性与区域性缺口，精准识别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等重点领域的人才需求，定期发布学科专业发展引导清单与预警清单，明确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育种等前沿领域的布局方向。在此基础上建立学位点增列“绿色通道”，对战略急需学科实施快速、精准、超常规布局，缩短政策响应与学科建设周期，实现学位点调整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28]。二是实施急需学科超常规布局，将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育种等“卡脖子”领域纳入急需学科专业清单，作为未来五年建设重点。通过专项经费支持、师资引进倾斜等政策工具，推动高校快速形成培养能力，减少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窗口期”错配。三是布局面向2035年的基础学科与交叉学科，为培育新质生产力、解决重大问题提供长期支撑。这一导向既能避免过度追逐短期市场热点导致的盲目调整，又能防止僵化守旧造成的调整滞后，为学科发展划定“红线”与“高线”，形成“十年磨一剑”的战略定力和“只争朝夕”的创新紧迫感的有机统一。

其次，充分发挥市场需求对学科资源配置的牵引作用，建立灵活的资源动态调配机制。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通过价格信号、供求关系与竞争机制，精准捕捉产业升级、技术革新对学科建设的现实需求与未来导向，为高校学科资源的动态优化提供市场化逻辑与运行路径。一方面，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契合产业升级方向的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建设，支持校企联合开展靶向性科研攻关与定制化人才培养。建立产学研利益共享机制，推动高校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以产业反哺学科建设，形成学科建设支撑产业发展、产业发展反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适配产业需求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培育第三方评价机构，构建以市场适配度、用人单位满意度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其评价结果可以作为高校学科调整与资源配置的参考指标。此举可打破单一行政评价的局

限，强化市场需求在学科资源配置中的牵引作用。

（三）深化开放协同生态：消弭内外脱节的生态壁垒

首先，深化高校与企业的协同育人合作，将市场需求深度融入学科专业建设全过程。一方面，企业应通过共建产业学院、联合实验室等形式，深度参与学科规划、课程设计与师资建设，将产业前沿技术与实践项目转化为教学资源，实现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的无缝衔接。另一方面，高校可探索建立“产业导师”制度，吸纳企业技术骨干参与课堂教学与科研指导，在打通高校与企业在人才、知识、技术等方面的双向流动通道的同时，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开展订单式培养、项目制学习，如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领域的企业与高校联合制定培养方案，缩短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的适配周期。

其次，强化产教融合与动态反馈，构建学科专业调整的闭环机制，确保内生动力持续迭代。高校作为学科建设的主体，既不能因短期潮流盲目迎合，更不能脱离社会需求空谈发展，而应立足教育规律与市场规律的辩证关系，在坚守基础研究“慢功夫”的同时，主动对接科技革命的“快变量”，避免因盲目迎合短期潮流违反学科发展规律。一方面，高校应主动对接产业需求，与行业龙头企业共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将企业技术难题转化为学科研究方向，将产业标准转化为人才培养标准。另一方面，建立校内学科专业动态监测与预警系统，整合毕业生就业质量、用人单位反馈、科研成果转化等多维度数据，定期开展学科适配度评估，加强与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平台的联动，精准捕捉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缺口，为学科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最后，构建“多元协同、分层衔接、分类施策”的学科设置调整保障机制，实现学科发展的差异化与协同化。现有官方政策文件中对如何做学科专业设置调整的“减法”已有明确指向，“对高校连续五年未招生的专业予以撤销处理”“对本地区布点量大、就业率过低的专业及相近专业，原则上不再支持增设”^[29]。学科专业设置调整实践过程中如何做“加法”则未明确，值得进一步探讨。针对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构建国家、高校、社会多元协同治理体系；统筹专科、本科、研究生各层次学科专业目录衔接；区分基础学

科专业、应用学科专业、技能专业分类建设与动态调整。基础学科专业超前布局、长周期建设,夯实战略根基;应用学科专业超快布局、快速响应科技发展与社会需求,强化适配能力;技能专业服务产业变革,直接对接行业与企业需求。这种立体交叉、协同统筹的学科专业体系,既避免了学科建设的盲目竞争,又通过差异化定位提升了整体效能,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学科专业设置调整绝非简单的资源配置问题,而是关乎国家核心竞争力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系统性工程,应在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中实现动态平衡与螺旋式上升。基础学科专业当秉持“以不变应万变”的战略定力,坚守知识传承与原始创新的学术初心,保持长周期建设的战略耐心,以深厚学理积淀筑牢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为国家长远发展提供持久的智力支撑与创新源泉;应用学科专业与技能专业则需践行“以变应万变”的适配逻辑,精准锚定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升级的时代脉搏,强化与市场需求、行业标准、国家战略的动态契合,以灵活迭代的发展模式主动回应时代诉求。面向2035年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我国学科专业调整亟须实现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引领”的范式跃升,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配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一方面,需依托AI赋能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大模型,打通国家战略、科技前沿、产业需求的数据壁垒,构建智能感知、精准预测、靶向调控的闭环体系,为学科布局提供前瞻性指引。另一方面,需健全“国家、高校、社会”多元协同治理机制,耦合“基础学科、应用学科、技能专业”分类支持策略,既赋予高校在学科布局、资源配置、人才培养中的充分自主权,激发院校内生动力与创新活力,又激活市场主体、行业协会等在需求传导、协同育人、成果转化中的内生动能,形成多元共治、协同高效的良好生态。唯有如此,才能使学科专业体系既成为传承人类文明、培育学术薪火、塑造时代新人的重要载体,更成为孕育新质生产力、突破“卡脖子”技术、服务民族复兴伟业的核心引擎,最终形成兼具中国特色、世界水平与普遍意义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发展范式,为全球高等教育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全球创新版图中国占据战略制高点。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EB/OL]. (2024-07-21)[2025-05-15]<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40721/ded6316ad77344cf9a2a45463ec1288b/c.html>.
- [2] 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33-35.
- [3] 翟亚军.大学学科建设模式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8.
- [4] 王战军,杨旭婷,刘静.监测之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合理性及其价值[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6):35-44.
- [5] 宣勇.大学学科的建设与评价:从事学科研究20年的回顾与展望[J].大学与学科,2023(1):1-9.
- [6] 方增泉.略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学的学科调整:从大学教育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的角度看[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128-137.
- [7] 陈卫.新时代优化学科设置调整的基本逻辑遵循[J].中国高等教育,2025(6):11-13.
- [8] 郭大光.面向2035:高校学科优化调整布局的思考[N].光明日报.2022-10-11(15).
- [9] Paynter N, Mishra M, Kreit B, et al. Navigating the Tech Talent Shortage[EB/OL]. (2024-06-11)[2025-05-17].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insights/topics/talent/overcoming-the-tech-talent-shortage-amid-transformation.html>.
- [10] 赵阳,金文燕.基于“双一流”建设和学科评估指标体系的人才培养导向研究[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98-110,124.
- [11] 黄容霞,顾一泓,秦越.高水平行业特色高校本科人才培养的特点与路径:基于30所高校第二轮“双一流”建设方案的分析[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5(2):98-103.
- [12] 田贤鹏.高校学科专业动态调整中的市场调节失灵及其矫正[J].教育发展研究,2017(21):16-23.
- [13] 马永红,德吉夫.“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大学跨学科组织的学科网络结构研究[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0(6):30-36.
- [14] 姚云,孙士茹.行业特色高校学科专业的设置及调整优化[J].北京社会科学,2024(9):96-107.
- [15] 王战军,张微.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高校学科结构调整: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J].中国高教研究,2019,(12):36-41.
- [16] 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徐辉,郑继伟,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23.
- [17] 教育部.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EB/OL]. (2024-10-31)[2025-11-19]. http://www.moe.gov.cn/jyb_xxgk/s5743/s5744/202410/t20241031_1160042.html.
- [18] 宋佳,王科瑞,张雅茹.多重制度逻辑下一流大学学科布局与调整研究:基于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数据[J].高教探索,2024(5):66-74.
- [19] 包水梅,陈秋萍.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优化学科设置调整机制的基本逻辑[J].中国高等教育,2024(18):32-37.
- [20] 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

- 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的通知[EB/OL].(2023-04-04)[2025-05-15].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4/04/content_5750018.htm.
- [21] 陈思宇,王洋.以学科专业布局优化调整为重点推进大学创新体系升级[J].北京教育(高教),2025(5):11-14.
- [22] 葛晓波.职业院校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时代意蕴、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中国高教研究,2021(5):98-102.
- [23]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2020[EB/OL].(2022-02-10)[2025-10-19].<https://nces.ed.gov/pubsearch/pubsinfo.asp?pubid=2022009>.
- [24] 李曼丽.高校学科专业调整优化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J].北京教育(高教),2025(10):16-19.
- [25] 尹怡,毛国羽.复杂适应系统视角下高校学科专业调整优化的机制与路径[J].重庆高教研究,2026(2):65-76.
- [26] 王战军,张微.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交叉学科建设价值内涵及实施方略[J].大学教育科学,2023(1):26-34.
- [27] 王战军,张微,乔伟锋.AI赋能研究生教育管理GROM理论构建[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4(12):1-8.
- [28] 靳天宇,李照宇,刘惠琴.战略性新兴产业学科布局优化调整:基于新增学位授权点的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25(11):41-48.
- [29] 教育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EB/OL].(2025-06-23)[2025-11-13].http://www.moe.gov.cn/s78/A08/tongzhi/202506/t20250630_1196068.html.

A Review of Issues and Prospective Pathways for the Adjustment of Discipline and Program Structure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WANG Zhanjun ZHANG Wei ZHAI Yajun

Abstract: Disciplines and academic programs constitute the core pillar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ir structural adjustment serves as a critical lever and strategic engine for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building a strong education system. China's adjustment of discipline and program structures faces thre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a temporal imbalance of fast versus slow, a perceptual disjunction of near versus far, and an ecological disconnect of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At the root of these challenges, rigid administrative controls and entrenched approval procedures hinder timely and flexible responses to strategically urgent national priorities. At the market level, fragmented demand signals and the absence of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prevent accurate transmission of industry and enterprise needs to the practical configuration of academic programs.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path dependency and limited responsiveness within universities, combined with underdeveloped interdisciplinary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valuative incentive mechanisms, constrain the internal dynamism and effectiveness of program adjustments. Addressing these challenges requires activating dynamic response mechanisms to construct a flexible adjustment system that balances speed and order, aligning adjustments with strategic demand to transition from passive adaptation to proactive responsiveness, and fostering an open, collaborative ecosystem to create an interlinked, cross-sectoral academic development community. And construct a "diversely collaborative, layered connection, and categorized implementation" support mechanism for discipline and major settings adjustments, achieving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education chain, talent chain, and industry chain.

Key words: discipline and program structures adjustment; higher educatio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national strategic demand

(责任编辑 陈剑光)